

北京历史文化学术讲座

隋唐时期的幽州

劳允兴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辅导部 联合主办

1986年10月·北京

目 录

第一节 隋东北军事重镇	(1)
一、幽州总管府与建立涿郡	(1)
二、开凿永济渠, 兵伐辽东	(1)
三、隋末农民起义与罗艺占据幽州	(2)
四、涿郡宫寺与房山刻经	(3)
第二节 唐前期的幽州城	(4)
一、贞观年间的幽州	(4)
唐太宗与幽州城形制的确定 (4) 唐太宗以幽州为融合各族人民的 聚居点 (5)	
二、武则天时期的幽州	(6)
东线战起 (6) 东都、幽州、营州 (7) 东线战事拖延与“安 辑方略” (9)	
三、幽州城的繁荣	(10)
四、幽州地区的文化	(12)
第三节 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幽州巨变的先兆	(15)
一、安禄山、史思明	(15)
安禄山、史思明的出生地 (15) 任用安禄山、史思明为将领 (15) 以范阳为中心的势力范围 (16)	
二、“安史之乱”战起	(17)
三、史思明以范阳为燕京, 称大燕皇帝	(17)

第四节 河北三镇之一的幽州镇 (18)

一、朱滔、朱泚之乱 (18)

二、刘怵、刘济治理幽州 (19)

三、后梁、后唐争夺河北与刘守光在幽州称帝 (20)

隋唐时期的幽州

第一节 隋东北军事重镇

一、幽州总管府与建立涿郡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政权后，东北继续设立军事机构幽州总管府，总管“六州五十镇”，与并州、营州、朔州、代州等各军事区域，联合防备突厥、契丹。文帝任命重要军事将领担任幽州总管，驻幽州，先后有于翼、阴寿、李崇、周摇、燕荣等。

突厥兴起于六世纪中期，至木杆可汗时，“西破哒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不断入幽州，杀掠吏民，留屯塞外。北周曾以千金公主妻突厥沙钵略可汗，隋代周后，千金公主请沙钵略复辟周室，沙钵略乃与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又连结契丹、靺鞨，举兵反隋。幽州总管阴寿，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与并州总管虞庆则屯兵数万防御。开皇初，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击高宝宁，高逃奔契丹被杀。

开皇三年（583年）六月，突厥寇幽州，总管李崇战于砂城，全军复没。此后，燕蓟多次被突厥扰害。周摇继任后，值突厥分裂，各部纷降，契丹内附。幽州总管又对东北“九夷八狄，绥怀抚慰”，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东北渐趋安定。

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突厥启民可汗率领东北奚、霫、室韦等族首领及民众，参加修建自榆林郡（治所在榆林，今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开三千里御道，东达于蓟。炀帝北巡出塞，由此御道至涿郡。

隋灭陈统一全国，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后，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又以集中全国兵权于中央，废诸州总管府，幽州总管府遂废。迨大业三年，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改地方三级制为两级制，改州为郡，以郡统县。旧置幽州改为涿郡，治所在蓟城。涿郡户口84000多户。

二、开凿永济渠，兵伐辽东

隋文帝时就想加强对太行山以东，河北平原包括幽州等重要都会的联系，改善通往这里的交通条件。炀帝在榆林时，曾诏见高丽使节，此时已有向辽东用兵的意向。所以，用兵辽东，加强河北地区的经济联系，以及炀帝游幸北方等原因，开凿一条由首都长安、东都洛阳北达幽州的水路运输线，已是十分必要了。

大业四年（608年），发河北男女百余万凿永济渠，是为大运河的北段。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长安，南至余杭，北达幽州，全程分为四段。洛阳以南有三段：通济渠、邗沟、江南河，至余杭为终点；洛阳以北是永济渠，直通幽州。永济渠是从今河南武陟县截引沁水为水源，通至黄河，东接清水、淇水，顺曹操开的白沟北流，通往内黄、魏州（今大名）、临清、贝州（今清河）、东光等富庶的地方，到今天武清

县入永定河（当时称桑乾河，古代称瀑水，即今天北京城南的凉水河），直达蓟城南郊。这最后的一段，并不是经由今天北京城东的那条北运河。隋代还没有这条河，它是后来金元时期开凿的。

永济渠开通后三年，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决意向辽东用兵，自江都（今扬州）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四月至涿郡之临朔宫，下诏曰：“省俗观风，爰届幽朔”；“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执锐勤王，捨家从役，罕蓄仓廩之资，兼损播殖之务”。事实果然是这样，他已经下令“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镦手（排即盾，镦是小矛）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

同年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今河北保定、博野），供载衣甲幔布，令兵士自挽之。”

同月，“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

同年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黎阳仓、洛口仓俱在当时的运河线上。

从全国的广阔地区，西到关中，南及岭表都是征发士兵的范围；军需运输的民夫，更远超过军丁的人数。水陆征调的沿途，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今河北、山东一带是进攻辽东的基地，在这个区域内，北端涿郡集中陆军；东端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驻屯水军。幽州总管元弘嗣在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民夫，昼夜立水中，不敢休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四方兵集涿郡。“诏左十二军出饒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余、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碣石、东臯、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餽运者倍之。”炀帝亲赴辽东，临行祭社于南桑乾水上，祭天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并举行亲授节度于将军的仪式，然后顺次序仪法，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发四十日乃尽，首尾相连，鼓角传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如此威武的部伍，徒有虚名，不能应敌，指挥失度，接连败北。至七月，九军度辽皆陷，资储器械巨万计，死亡荡尽，只得班师而返。炀帝在涿郡短暂停留后，车驾至东都，两年后，大业九年（613年）正月，再下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四月率师渡辽，被阻于坚城之下，会杨玄感在黎阳反叛，仓卒返师。大业十年（614年）二月，炀帝第三次下诏复征天下兵，三月又亲至涿郡，督师伐辽，各道俱进。此时天下已乱，士卒在道，逃亡相继，所征兵也多失期不至，出师仍失利。

三次伐辽战争，激发了推翻隋王朝的农民大起义，在起义的熊熊烈火中隋王朝灭亡了。

三、隋末农民起义与罗艺占据幽州

炀帝三次伐辽东，全国财力俱竭，百姓困穷，黄河下游的人民更是遭受惨重的徭

役、兵役的负担，比其它地区尤重。涿郡地区的人民，自然也是备受各种役使之苦的。大业七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这样严重的遍及全境的大水灾，人民在遭受国家的大征发之下，完全失去防灾、减灾、抗灾的能力。今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面临死期交急，倘不栖身沟壑，只有逃亡，投身起义。随之四海之内，兵革咸起，反抗隋朝暴政。山东地区遂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涿郡也就成为激烈的斗争中心。

涿郡附近上谷王须拔自称漫天王，立国号燕；还有魏刀儿自称历上飞，众多十余万；幽州人杨仲绪亦率众万余人，纷纷树起反隋斗争旗帜。河北起义军窦建德，于大业十二年（616年），以精兵七千，袭杀涿郡通守郭绚所率万余人，获马千匹，并追斩郭绚于平原，威震山东。次年七月，隋炀帝命涿郡留守薛世雄督兵三万，自涿郡出发，讨伐起义军。兵至河间，驻营七里井。窦建德亲率精锐二百八十人，自武强来河间迎战，夜行一百四十里，及近隋营，天将薄明，疑隋军似有戒备，又拟闻吹角声发。须臾，大雾忽起，窦建德果断地抓住战机，突袭隋营。隋军于雾中不辨战情，猝然遭袭，兵遂大乱，弃甲奔亡。薛世雄已不能稳定阵势，只得仓促上马急走，身中数枪，仅率数十骑逃回涿郡，不久郁郁而死。窦建德以二百多精兵，击破隋军涿郡主力三万人，极大地鼓舞并推进反隋斗争进入高潮。

不久，王须拔战死；魏刀儿被杀，其余也均战败，所部兵众并于窦建德军，窦建德曾率军三次进攻涿郡幽州城，都未能攻克，后转战于河北各地。武德四年，败于李世民。山东河北之人久久怀念窦建德，据传今房山窦店曾有窦建德墓。

各地起义军竞起后，涿郡留守将领们不能支持防守，隋将罗艺占据郡城，发府库财物给战士，分仓粟于民，取得信任，后杀掉异己势力，自称幽州总管。涿郡号称富饶，屯师数万，伐辽兵仗俱在，临朔宫多珍宝，仓库盈羨，远近咸来归附。罗艺终以涿郡请入于唐。

四、涿郡宫寺与房山刻经

涿郡蓟城有临朔宫，是专为隋炀帝建造的行宫，由隋著名的技术专家阎毗设计营建。阎毗曾参加大兴城的建设，还参加过修隋代长城及“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阎毗能够融合西域文化，设计建筑临朔宫怀荒殿，宏大华丽，很有特色。炀帝在临朔宫宴西突厥处罗可汗，接以殊礼。隋末，罗艺占据涿郡，临朔宫所藏珍宝，曾分予部下，后至唐时，此宫仍存在。以后或被水冲毁，或遭火焚，考其遗迹，已荡然无存。

隋代涿郡佛教发展，蓟城内外有几处佛寺，如唐僧道宣《续高僧传》记载，仁寿二年（602年），于幽州宏业寺建立灵塔。宏业寺是北魏孝文时建，旧名光林寺。此灵塔应是蓟城内最早建的塔。仁寿四年，幽州刺史窦抗于城内智泉寺“创木浮屠五级”，此寺原为后魏时尉使君寺，隋改名智泉寺，至武则天时，各州郡皆建大云寺，此寺又名大云寺，开元中改称龙兴寺，至太和年间，“灾火延寺浮屠灵庙，飒为烟烬”。隋佛教文化著名古迹，以“北京敦煌”著称的房山石刻，最享盛名。房山石刻，是指今北京西南约七十五公里的白带山山岩石洞内的石刻佛教经文。大业年间，隋僧静琬师承北齐南岳慧思和尚遗志，为防佛经遭到毁灭，发愿刻经，选定在幽州北山即白带山开凿洞窟，凿

石为室，藏石经板于洞室中。据知，山上有九个石洞，分上下两层，最先开凿的是雷音洞，又名华严堂。洞外有汉白玉石栏杆围护，洞顶有巨石为檐，洞前是悬崖峭壁，洞内宽广如殿堂，四壁镶嵌一百四十六块隋和唐初刻的石经，四根八角形石柱支撑中间，柱上满雕佛像，称千佛柱。洞门额头有静琬的刻经题记。其余八洞，五十年代曾打开过，后又封锢了。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静琬于大业年间迄唐贞观年间，刻成《大涅槃经》。

隋炀帝至涿郡时，萧后曾施绢千匹及其它财物，予以资助，而朝野官僚贵族、豪绅富贾也争着捐舍，形成涿郡地方崇信佛教成风，起到了统治者靠权威无法起到的统治作用。

第二节 唐前期的幽州城

一、贞观年间的幽州

唐帝国建立，版图辽阔，民族融合，“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这是唐太宗自高祖时平定中原后，又以大半生的精力征服或怀柔边境各族，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而出现的统一局面。民族和睦，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北方边塞重镇幽州，贞观时期各族在这里聚居，向着显要名城发展。

（一），唐太宗与幽州城形制的确立

幽州（隋称涿郡）治所为蓟城，也称幽州城，城址自魏晋以来没有扩大迁移，但其形制规模至唐代才有明确记载。以《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还有《元和郡县志》等，均记载蓟城城址南九里，东西七里，是长方形状，周长三十二里，折合今约二十五里。城垣位置除载于文献资料外，近年来北京地区唐、辽墓志石刻出土，对幽州城的定位、复原，可以佐证。然而唐太宗敕命修建悯忠寺，迄今仍在原址没有徙置，也最能说清蓟城的方位，并由此可以探寻全城的形制特征。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凭籍强盛的国势亲攻辽东，大将李世勣会集陆军战斗主力于幽州。当年四月，唐太宗在蓟城南郊誓师进兵，五月渡过辽水到达辽东前线，九月退返蓟城。为了悼念出征阵亡将士，安抚军心，下令在蓟城东南建悯忠寺，即今法源寺的前身，并在幽州城西十余里建哀忠墓。至武则天时，“追感二帝（太宗、高宗）之志，遂建是寺以悯忠为额”。以后历代对这座寺庙都能注意保护，至清雍正初改名曰法源寺。因其位置成为推定幽州城址永久性的依据。城址位置。大体说来，东城垣在宣武门大街西烂漫胡同一线，西城垣在今小马厂过甘石桥东侧，南城垣在今白纸坊街至姚家井，北城垣在今会城门公园至新文化街。城内面积为九平方里。唐太宗虽然在幽州城居留不足月余，但他对幽州城形制布局建设及主要建筑是十分洞悉的，选定悯忠寺的城址，可以认为是对全城总体有明确认识的情况下决定的。幽州城也是效法隋大兴城即首都长安而建设的。据会昌六年（846年），采师伦书，记旧藏智泉寺的舍利，因寺毁改归悯忠寺保藏的经过。文中记载“智泉寺……即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街之北面也。”智泉寺毗邻悯忠寺。“子城东门”是四世纪时前燕慕容儁建都的宫城的东掖门，“东百余步”，也就是说，如由悯忠寺西行“百余步”，就可以到“子城东门”了。

“大衢的北面”，即现在南横街北面，恰与法源寺位置相合。景福元年（892年）沙门南叙撰，僧知常书《重藏舍利记》碑文亦云：“大燕城南，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也与今天法源寺门向南横街情况相符，然则悯忠寺在幽州城东南隅，与前一碑文互证，幽州城与城内子城都可以据以探寻了。子城位居大城的西南部，考其四面城垣，北墙在今广安门大街西段，东墙在今北线阁迤南一线，南墙略当今白纸坊大街北，西墙在今广安门外南街一带。四墙正中均有门，东西二门则称东掖门和西掖门。东掖门可以直通向街衢，即今南横街。子城不居全城中心，是选在地势高处营建因而偏向西南的，也有如梗居城中会造成往来交通不便的缘故。所以悯忠寺启建之初，是考虑到有与子城一东一西遥相对应之势的。幽州城“开十门”，各门名称未记载下来，以四城长度推测，南北各三门，东西各二门。城内有二十六坊，坊名散见于后来宋人游辽、金时燕京的记载及出土的墓志。各坊的方位也多是无从考定了。各坊间有围墙相隔，坊有坊门和门楼，均设标志，坊内小路联结市井相通的大道。坊里治安、巡逻、宵禁等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依唐律规定，坊门晨启夜闭，与城门开关时间相同。闭门后夜行“犯夜笞廿”；坊里间墙垣及官署廨垣皆不准攀越，违者“杖七十”；每年只有正月十五日开放宵禁，故曰：“金吾弛禁，特许夜行”。幽州城北为固定的市肆之区，作坊、店铺，按行开市，盛唐时继有发展。城内还有其它寺庙道观建筑，如“兴国寺在旧城北……，有唐虞世南书念佛堂金字牌；奉福寺按旧记寺起于魏孝文之世”，“贞观十年诏仍旧基加修葺”，皆杂于坊巷间。其它如仓库、官廨、校场等，约均在子城附近。

西山山麓北部的兜率寺，即今卧佛寺也在这时始建。

（二）唐太宗以幽州为融合各族人民的聚居点

唐太宗以半生的精力实现“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而对东突厥战争的胜利，是实现这一局面的转折点。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战败崩解，颉利可汗也成阶下囚。“突厥即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处理战后的突厥民族问题，制定决策是关系全局的大计。为此大臣们展开热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是将突厥民族尽数驱逐塞外，“纵之使还故土”，还是收居内地。而收居内地的分歧措置是“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勢分，易为羁制”；抑或是“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前一种意见是魏征的主张，没有得到唐太宗的重视。后两种意见，前者是曾任隋幽州总管的窦抗之子窦静提出的，他暗熟对付突厥的边防事务；后者提出的是对幽州地区及北方民族部落十分熟悉的温彦博。温彦博曾授幽州总管府长史。武德年间，突厥入塞，彦博没于虏庭，迁于阴山苦寒之地罚为苦役，因而他对突厥等北方民族有较深刻的了解，他能够总结汉代以来处理民族事务的成功经验，比较充分考虑民族的长远利益，提出切合实际状况的意见，虽然他的意见也包含使突厥民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的内容，但确信突厥民族“怀我德惠，终无叛逆”。他进一步阐述认为“我援护之，使居内地，我指麾之，教以礼法，数载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其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这显然包含着以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卓识，唐太宗果断地采纳温彦博的意见，定为决策。对突厥降众安置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朔方之地，突厥的原有

部落几乎全部保存下来了。幽州城成为民族杂居融合的城市。

唐太宗也根据各民族居住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多种灵活的政策,如招抚东北民族;与吐蕃和亲等。平定突厥战争后,安置措施正确,“诸蕃君长诣阙稽颡,请太宗为天可汗”,“诸部相率内属”,而人口骤增,边境开发。以东北一线来看,“自燕州以下十七州(包括燕州、威州、思顺州、玄州、崇州,……安东都护府,新城州都督府、辽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等),皆东北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这种在民族聚居地区设立羁縻州,实际是相当于民族自治的州县。民族人口较多,地区较大的设都督府,均吸收任命该地区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职务,并可以世袭,“虽关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各州都给以一定的自主权,可以保持本族风俗习惯,按本族的特征,统治当地。燕州以下十七州中之安东都护府,为镇抚辽东的国防重任机构。自唐太宗至唐高宗先后向辽东用兵,至总章元年“复置安东都护,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薛)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都护之职责为“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覘候奸谲,征讨携贰”。后来东北边防形势变化,安东都护曾由幽州都督及平卢节度使兼领。幽州地位的重要方面是面向东北,吸引各族,实际是成为北方中心。虽然唐太宗对各族实行开明的怀柔政策,是仍然保持政治上的统属关系的。但是突厥,契丹、奚、靺鞨、高丽、室韦、铁勒等各族人民迁来幽州城及附近地区。幽州城内外、民族杂居,和睦友好,确是贞观年间出现的新局面。

二、武则天时期的幽州

唐高宗征辽后不久,至武后初年,东突厥复起,东北边族奚、契丹孕育强大,受其影响桴鼓南下;而突厥与吐蕃联合,更成为唐帝国的严重威胁。巨镇幽州,担负了繁重的军事防御重任,朝廷许多重要政治军事人物,被派来这里。各方面的矛盾交织,终致爆发震撼历史的变乱。

(一)东线战起

唐帝国从高宗至武后,仍属盛唐阶段,但边境报警,袭来危机。局势遽然吃紧发端于西线吐蕃的进攻。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与于阗袭击龟兹,截断西行的通道。唐朝廷只得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从东北前线调薛仁贵,征吐蕃,又大败于大非川。吐蕃继续西进,攻陷鄯州、廓州、河州、芳州,接近关中地区,危及唐帝国的基地。至永隆元年(680年),吐蕃已发展为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的局面。高宗为避西北兵锋,频到东都,“停封中岳”,以“西边不静,瓜沙路绝”为腹心大患。此时,北方及东北边族战起,告急频仍而来。调露元年(679年),北方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附近二十四州首领皆响应,众数十万,这是东突厥势力复起重建汗国的先兆。从此北方突厥又行南下,劫掠袭击河北诸县。不久,突厥二部被幽州大都督裴行俭率兵先后平定,而阿史那骨笃禄重又招集散亡,据黑沙城(在今呼和浩特北面),出掠九姓铁勒畜马,势力壮大,部众奉之为颉跌利施可汗。骨笃禄以弟默啜为设(典兵官衙),咄悉匐为叶护(统领),治理部众。单于府降户部落检校阿史德元珍,降骨笃禄,如虎添翼,专统兵马,相与为谋,遂

于永淳元年（682年），正式崛起南进，攻占单于府北，下并州，次年岚州、方州、定州、妫州。又围单于都护府，攻蔚州及丰州。垂拱元年（685年），骨笃禄以丰州一带为根据地，南下朔州、代州、忻州；东至昌平；西攻占鄂尔多斯黄河以北以西各地，唐北边各州，皆遭其扰。唐朝廷对付西线方急，一时无力抵御，遂出现朝议欲废丰州，撤出河套地区，以灵州、夏州为边防的意见。丰州司马唐休璟坚持力争，主张“丰州阻河为固，居贼要冲，自秦汉以来列为郡县，土宜耕牧。隋季丧乱，迁百姓于宁、庆二州，致胡虏深侵，以灵、夏为境。贞观之末，募人实之，西北始安。今废之，则河滨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终未放弃。垂拱二年（686年）九月，从西线调黑齿常之拒突厥，获胜。但至次年十月，突厥大败唐军，武后“改骨笃禄为不卒禄”。其后，又从西线调王孝杰率军来北线应急，“相次陷没，三军震懼”。

延载元年（690年），骨笃禄卒，其弟默啜自立为可汗。兵力大盛“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并与吐蕃相呼应。从此北线紧张，大有超过西线防务之势。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由突厥煽诱并已孕育强大起来的奚、契丹部族，也在伺机而发。自慕容氏入中原后，奚、契丹据东北空虚地带，殆已发展二百年了，太宗征辽后，始置松漠都督府，复置饶乐都督府，兼置东夷都护以统松漠，饶乐之地”，羁縻奚、契丹部族。这一带位居今西喇木伦河上游，松岭山脉，横分老哈河，滦河之源，山深林密，水草饶美，适宜游牧。铁骑驰突，极易南进；而平地松林，“树木既闾”，“据深林必死之地”，唐军很难深入武力征服。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占据营州，奚亦附合，共同尊奉默啜，铁骑南下，直逼幽州。至此，又复出现东线战场的严重局面。并且的确一度北线、东线同时告急，而东线局势更为严峻。“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全边境绵长战线，皆陷于被动。吐蕃向武后索取安西四镇和西突厥十姓百姓；默啜更借东线战事紧张，“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穀种、缯帛、农器、铁”。武后被迫“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并给穀种四万斛，杂缯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并许其昏”。此是“供寇兵，资盗粮”，不久默啜派兵袭并州等地。长安二年（702年）五月，以相王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军元帅，以魏元忠为之副。与突厥战于六胡州，战败。此次战役在突厥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勒碑铭文中均有记载。

（二），东都、幽州、营州

武则天创业重统，留居东都，转移全国重心于洛阳，并改为神都。东都因其地理位置，“当天下之枢，陆行漕引，方舟击舫，省费万计”，同时取资东南江淮及河朔等地“格藏储粟、积年充实”。比较起来长安确实难与相比。关中地区供给常处窘乏，经济重心东移，也是必然的。此时，东线战起，加强应敌，部署防御，东都更便于掌握全国局势。武后常居于此，大臣们也都纷建第宅，俨然已成首府。为了屏障东都，北御突厥，于并州置为北都。军需转输河北，在清河设北库，“江淮郡租布贮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安史之乱前，这里尚存“讨默啜甲仗藏于库内五十余万”。供应东线军用物资以达幽州，其数目之大，煞是惊人，“具精甲百万，以临蓟门，运海陵之仓，驰陇山之马，积南方之甲，发西山之雄，倾天下以事一隅”。“王师出讨，士马云集，军务星

繁，粮馈金甲，动以亿计”，“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这许多记载恐不属夸张，是基于事实的。“关河向北，转输幽蓟”，幽州历来是向东北用兵的转输中心要地。此时，“自河以北，幽州制之”其重镇地位不仅是有防卫河北，还有承担东都洛阳安全的重要作用。如果幽州一旦失据，黄河以北将无险可守，东都即将暴露于敌。突厥各部统一后虽然已渐向西发展，然则附势而起的奚、契丹，兵锋从东而南下，各部铁骑将越过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分界线，跨过长城长驱南下。这时河北道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在加强，幽州的战略地位更是突出。唐朝廷要以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部署防御，在幽州设指挥中心总管府。虽然自北齐、隋及唐初，这里也曾多次建立过总管府，但还从未承担过如此繁重的防御重任。东突厥复起之初，幽州是做为东路军驻地配合行动的。契丹、奚占据营州后，幽州已经首当其冲，直接面向前敌，成为河北防务重地。此时的幽州城，也直接得到武后的关心，建成悯忠寺，使自贞观十九年，由唐太宗下令在幽州城东南建此寺，即今法源寺的前身，经过五十余年，至此时建成了。同时改悯忠寺西侧的智原寺为大云寺，今其址已不存。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占据营州后，在突厥默啜支持下南来。唐廷立即发兵御敌，前后三次，每次兵力都在十余万以上，以扇形阵势进发。第一次是当年七月，以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遣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进讨。八月战于硖石谷，大败。第二次，是年九月，以武攸宜充诸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兵力筹集不足，“制天下繫囚及士庶家奴饶勇者官偿其值，发以击契丹”，同时“初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至次年三月，诸边道总管名将王孝杰将兵十七万，于东硖石谷大败战死。武攸宜为避兵锋，军渔阳，坐看幽州被劫掠。第三次，神功元年（696年）四月，派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又急从西线、北线调娄师德为诸边道副大总管，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二十万击契丹。连续三次发兵，总管府均设幽州。最后一次，武懿宗畏缩，军至赵州，闻前线失力，欲南遁，退据相州，幽州几将被突厥、契丹攻占，后因其内衅，幸未攻破。如此紧张仓卒发兵三次，契丹、突厥最后虽军退，但唐军应敌不利，损失残重。究其原因从一般条件分析，自营州失守，幽州失去军事上犄角之势，契丹据地势高处，倚燕山东麓，自高趋下，经峡谷，过大陵河、滦河、鲍丘水，至古北口、密云，直取幽州。唐军北上迎敌，山势峻拔，深沟阻隔，极易被诱入峡谷绝地。贞观间，对当地入居民族的怀柔政策，已经完全放弃，唐军不能指望得到支持。武氏亲贵将兵，滥杀无辜民众，如“懿宗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胁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先刳取其胆”，深失民心。此次战起突然，临时召募军队御敌，取“捷急之计”，“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以战耳，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使夷狄乘利，轻于国威”。又急从北线调兵，“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隍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此时，河北道府兵已经失去战斗力。

这次东线战争，无论对当地还是对全国，都有深刻的影响，河朔因“调发伤重，家道悉破”，和民众的矛盾十分尖锐。军队厌战也很严重。从山南、淮南调军，限日行百里，违限者处死，“全众皆怨，况兵疲不堪用。”陈子昂为武攸宜军府参谋，随军来幽州，目击这一切，虽有清醒的分析，却不得其志。他登上古幽州台，发出感慨，潸然泪下，表现了他的沉重心境。然而在战争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武后能于紧要关头，起用擢

拔干练人才，委重任于能臣，如狄仁杰、娄师德、唐休璟、宋璟等，挽回颓势，免于外患的扩大，人心的背离，稳定了东北一线的局面。

河北自唐初历来是不安定的，“山东雄猛，由来气重，一顾之势，至死不回”。此时，狄仁杰派赴河北，并来幽州。他先至魏州安定民众，“虏闻亦引去”，俄转幽州都督，又调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河北道安抚大使。狄仁杰针对武氏亲贵曾提出的“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诛之”；加罪于“契丹、突厥所胁从之人”，敢于向武后建言：“边塵暂起，不足为憂，中土不安，以此为事”，“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武后完全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狄在河北，“得突厥所驱掠者，悉还本贯。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恐诸将及使者妄求供顿，乃自食疏粝，禁其下无得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清代顾炎武来河北，至昌平，他说：昌平西八里为昌平旧县，“唐狄梁公祠香火特盛，岁四月朔，赛会，二三百里内人至者肩摩踵接，考之唐书，突厥陷赵、定，纵掠而归，公为行军副元帅，独以兵追之不及，又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意其尝至此也”。“昌平县西有慕狄台”。岁月远逝，狄氏卓勋，逾千余年，仍“绵邈流芳”。

武后末年，东线方面先由张仁愿、李多祚，后由唐休璟主管战事。唐休璟暗练边事，检校幽、营等州都督，兼安东都护。其实此时营州仍陷于契丹，故地早已放弃，安东都护一职，形同虚设，唐休璟只是坐镇幽州。景云元年（710年），又以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使兼幽州都督。东线战火始于东突厥复起后对契丹的带动扇诱，因而在北线唐廷对付突厥的进袭，加强了防御措施。景龙二年（708年），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乘突厥大军西征突骑施，漠北相对平静时机，在河套北及东西两侧，筑三受降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有效地加强了捍蔽陇右、朔方的能力。默啜率兵西击突骑施，灭娑葛后，自恃兵威，虐用其众。后又北讨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归，被杀。奚、契丹也早因受其征役而结怨，开元四年（716年）奚、契丹及拔曳固等诸部皆内附唐廷，由北至东战事暂停，出现平静局势。次年，贝州刺史宋庆礼请恢复营州。自东线战起，营州失陷，幽州失去屏蔽。重建营州，可以“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从辽西到辽东均可控制，幽州安全也有保障。宋庆礼以数千人力，“无甲兵之强卫，指期遂往”。姜师度也参加建设营州，“寻而罢海运，收岁储，边亭晏然，河朔无扰”，“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数年之间，仓库充实，市邑侵繁”。“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招辑商胡，为立店肆”。营州地区民族流动转移聚居的情况是异常复杂的，表面上民族杂居，市井繁荣，贸易交往，掩盖着民族间的对立。唐朝廷对各族的吸引力已不同于贞观年间，尤其是大量的由中亚一带转移来的昭武九姓及突厥、回纥等胡族人以后，他们争生存进取，经商贩货的特殊本领，也会转化为野心勃勃地向中原地区发展势力。安禄山，史思明自身为营州杂胡，他们善于利用其中亚胡种商业语言的特点，兼及混合血统的胡人之资格，掌握武力以后，在其他种种条件促成下，终于从营州起家，到幽州敲起动地的渔阳鼙鼓。

（三），东线战事拖延与“安辑方略”

神功元年（697年）七月，武攸宜等自幽州凯旋，武后因“战胜”契丹而改元。实际东线边境战火未熄，局势并未安定，只不过是暂时的平静。对付契丹是取守势抑或

进攻征服，未有决策。战事拖延，积年逋讨，旷日持久。薛讷任幽州镇守经略节度使时虽暂无事，而孙佺继任后，率三军悬军远袭，冷陁一战（在今内蒙扎鲁特旗南奎屯山），全军复没。后宋璟贬为河北按察使，调迁幽州都督时，奚、契丹于先天元年（712年）十一月，“二万骑，寇渔阳”，“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开元以后，薛讷将兵六万出檀州，击契丹，至滦水山峡，大败。开元四年战事暂停，开元八年契丹可突干反唐，营州震恐，都督许钦澹移军入榆关，营州亦陷。开元廿一年，幽州节度使遣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榆关外之都山，可突干引突厥众参战，郭英杰战死，薛楚玉被虏杀害。翌年，幽州节度使调西线张守珪赴任，大破契丹，可突干被杀，东线战事又缓下来。

玄宗时期，国力又渐恢复，全边境形势是趋于稳固的。为充实增强各都督府的實力，于天室元年全边境设置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实力略次的经略使。其中范阳（幽州），陇右、河西、朔方，河东五节度使拥有最强的兵力，尤以范阳的兵力居诸镇之首位，统领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所在幽州蓟城，承担临制奚、契丹的重任。对东线作战方略最早提出“安辑之术，缓讨之理”的是张说，他于开元十年（722年）“改秩边镇，委重戎麾”，亲到河北幽州，备知边镇形势。他在“策问三道”中对边陲用兵，已经提出成熟的看法。张说认为：“若纵兵扬旌，则鸟散谿谷，及旋师反旆，则蚁聚津途，穷之则一切归降，置之又无不反复”，对游牧民族这一特征是掌握了。所以他主张，在河北屯田，丰国康边，“招抚归降”等防御战略思想。而稍后的张九龄，就不仅是在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寻求答案，而是以积极的防御战略，指挥东线的战事。张九龄以玄宗名义的十余封《勅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表现了他的政治家兼晓军事铃键的远见谋略。他暗熟东线动态，提出的军事方略具体明确。读这些信，可以概括以下几点：一，保存力量，秣马训兵，候时而动，待机破敌，必为远图，无得妄动；二，“因需且守，伺其方隙”“如此筹宜，应是长策”；三，寇抄之来，边境常事，苟非大敌，不劳我师；四，穷寇勿追，困兽犹斗：树木既阹，追击定陷“必死之地”。

这些方略，诚然就当时的局势来说是正确的，也确赢得东线的安定。张说、张九龄都怀有一定的政治远见，他们都有追慕贞观年间怀柔各族的积极愿望，并且胸有治国的大局，代表着唐帝国封建政权中的朝气蓬勃的政治力量，然则历史的演变，终究是循着另一轨迹跑下去了。

三、幽州城的繁荣

唐初经过社会动乱，人口锐减，幽州境内及包括檀州人口只相当于隋代涿郡的四分之一，计二万多户。半个世纪的恢复，至天宝年间，幽州一度更名为范阳郡，人口增加到67000户，37万人口，及到八世纪中叶，在今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内，人口达40万。

考察隋唐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以下的史实。

隋代开皇年间，曾引卢沟水开稻田，百姓丰给，这一水利设施，仍是利用旧有的车箱渠。入唐后河北道水利工程十分先进，数量也最多。幽州地区的水利恢复利用，也有

广泛的发展,永济渠的通流,更有利于水利事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水利设施的发达,直接决定农业经济的发展。贞观十三年(639年),“诏于洛、相、幽、徐……等州,并置常平仓。”无疑,这些地区都是产粮较多的区域,指定幽州,可以说明这里是全国可数的产粮地之一。唐太宗对河北地区经济的发达是有预见和展望的。武德时,平定刘黑闥于魏州后,其对高祖云:“……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天府委输,待以成绩”。不久魏州发展,人口达百万以上,魏州治所贵乡,可以自引永济渠开支渠,使江淮货物直抵城下。幽州比魏州更具有发达的条件,如与秦汉以来各历史时期比较,幽州更有繁荣的条件。到开元年间以后,张说领幽州,每年从这里有大量的“佣调缁布”,运入潼关到长安。从房山石经题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幽州城内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完善的,城垣高壮是砖城而不是土城,也足见此城各方面实力的雄厚,在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其经济的发达状况都未能超过。

幽州为北方军事重镇,大量军队驻屯,尤其是边境战争时期,必需要靠外地运输军粮。平常时期,粮食自给尚不匮乏,根据房山石经资料,幽州城的大米行、白米行、粳米行,还有油行,肉行、磨行,五熟行等,这些直接与粮食生产有关的行业,都有许许多多的供养人捐施刻造石经。而刻经是需要相当的财力的,是要以当地的农业发展作为基础的。所以,从石经题记中提供的实证资料,也可以说明幽州地区农业经济发达的事实。

幽州城内还有果子行,出售各种果品,而桑、枣、栗是当地土产,其中栗的出产最有名,“五方皆有栗,惟有渔阳、范阳栗甜美味香”。其它还生产药材,如人参、麝香、蛇胆、知母等。幽州燕山林木茂盛,张说在幽州,曾“命杼人斩木于燕岳,使通林麓之财。”林木多见山松、杉树,均为常绿乔木。杉木生长高可达卅米以上,为建筑工程中的优质木材。这一地区的木材资源是十分丰富的。

幽州地区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足称发达,盛产绫、绢、锦、帛等。绫、绢列为全国第五等,是向朝廷贡献的土产。房山石经题记中载丝织品生产行业数量最多,生产规模及分工都有相当的发展。丝织品绢,是代为货币,交易市场的。唐朝廷明令禁止与诸蕃就“诸锦、绫、罗、……、绩织成绢绢丝,……互市”。

铁的开采冶炼及采铜、铸钱,也具有相当规模。武德时幽州设铸钱监;开元年间,张说曾命人“采铜于燕山,使兴鼓铸之利”;安禄山居幽州,于“上谷郡起五铢铸钱。”

幽州城市有生铁行,也是禁止与诸蕃互市的。

幽州地区制盐设有盐池,政府设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每年收率满二千石以上。

幽州居转输中心,商业贸易发达。许多手工业品投入交换,促进商业繁荣。幽州市除米行、绢行、冶铁行等还有角行、皮行、毛鬃行、羊筋行、木行、竹行、石行、玉行、炭行、杂物行、新货行、椒笋行、布行、朴头行、靴行、社官行、社行、菜行、药行。百货交易,热闹繁荣。

幽州水陆交通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自永济渠开通,大运河畅行南北,两岸得到开发是在入唐以后。由幽州继续北行的水道,唐太宗曾命韦挺开辟,循曹操征乌桓时开凿的新河故道疏浚。当年新河的开凿,就是解决泉州渠和滦河间的联运的。泉州渠可以上通

幽州，“新河又东会于濡水”，濡水即今滦河。新河上源为鲍丘水，其西口接泉州渠。新河经过路线，大体是由今宝坻南，过唐山市南，在乐亭附近东接滦河。唐初故道仍应存在，后姜师度于“神龙初，……循魏武故迹”，利用疏凿，也是这段水道。贞观时虽未疏通或运行不远，但幽州居转运要地是显见的。

永济渠畅达幽州，同时沿太行山东麓北来的古道，并行辉映，来客将集于幽州城下。东北各族长期以来就“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这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也是联结辽河两岸与县城内外的主道。入唐后，交市贸易会发展活跃。自密云北口至东北全境的联络点营州路上，或由南口军都关通向山西北部达蒙古草原一路，贸易点或零星或密集分布。幽州通向东都洛阳，首府长安水陆两路都可以顺利到达，沿途“店肆待客，酒饌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幽州四郊各族农、牧民商队往来，贩运大批马、驼、牛、羊、皮毛、筋角、毡毯、人参、鹿茸等产品；由江淮水路船队运来的南方梗稻、纨缟、茶油、金属、竹藤制品等，陆续提供交易，幽州北市景象繁荣。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的物资运来幽州，供应军需。水陆不足通运，特开辟海运。在这之前，隋及唐初也通过海运，增强运输，未能定航。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幽州经略镇守使、河北支度营田使李适之，又加河北海运使职务。天宝元年（742年）又由裴宽继任河北海运使。此时，府兵制已为募兵制替代，兵士军需仰赖唐中央政府供给，十余万常备军的军需物资运输，必需专设海运使，由范阳节度使兼领，设判官具体行事。南来的装载军需船只，在扬州等处置仓上船，出长江口北驶入渤海，进军粮城海口，然后抵蓟城。今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刘台遗址，仍可以看到唐代海运的遗物。敦煌遗书中，也有关于唐代海运的一些资料。

诗人杜甫北游齐鲁，曾目睹海运状况，他在回忆写《后出塞》、《昔游》诗中道：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竿。

云帆转辽海，梗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

吴门持粟帛，泛海陵莲茭。

从诗中可以想像到，大量丰盛的物资，由海路源源运到安禄山的辖地，水手们远涉重洋，博风击浪到达蓟城，看到击鼓吹笙的情景，是兴奋不已的。海运是为边防军需运输开辟运行的。安禄山蓄谋反叛，籍机庞然坐大，已成尽人皆知。诗人爱国心重，碍于局势，不便露言过深，有缩笔讽刺的隐意，是十分明显的。

四、幽州地区的文化

幽州连接边郡，其风教文化自前代以来，并不落后于中原，且多文雅之士。唐代文学家、诗人等，也多到这里客游。陈子昂、张说、贾至，孟浩然、李白、高适、王之涣等都留下许多关于幽州的文章诗作。具有浓厚幽州地方特色的边塞诗，内容包括出征塞外、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民俗风情等。许多作品还表现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陈子昂的古体诗《登幽州台歌》抚今思昔，悲怆壮烈；《蓟丘览古》咏史寄志，思古

前贤，有不同凡响的豪迈气概。开元年间，享有大名，有“大手笔”之称的张说，他在幽州写的诗篇，怀抱以身许国的壮志，奔赴边陲，乐观爽快，如《幽州新岁作》一首：

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

.....

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灯火澈明开。

又如《巡边在河北作》曰：

沙场磧路何为乐，重气轻生为许国。

贾至的《燕歌行》，对幽州重镇的形势，有出色的描写，诗中说：

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

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擒单于。

前临滹沱后易水，崇山沃野亘千里。

孟浩然《蓟门观灯》一首，很能表现当地民俗：

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

蓟门看火树，疑是烛龙然。

高适的《蓟门行》，展现了一幅幽州原野上的动人画面：

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

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

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

诗中可以体会到，民族杂居的幽州，强悍尚武，青年健儿，挽弓骑射，在猎猎秋草中，号角劲吹，纵横驰骋。

诗人李白憧憬古地幽州，于天宝十年北游塞垣，“沙塵接幽州，烽火连朔方”。这时正是安禄山叛变前三年，面对幽州的严峻形势，他的诗作中有沉痛地叙述：

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罗星。

.....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

诗人在无可奈何之下，只有“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去过他的避世游仙的生活。他来到渔阳，当地新建独乐寺，寺内观音阁，巍峨高耸，气势宏伟。此阁是木结构的建筑，李白书写匾额，置观音阁第一层檐下。书曰：“观音之阁”四字，竖写右起二字二行，径长七八尺，署名小字“太白”于“阁”字下，敬谨尊重，完全属于唐代人题额的型式。此匾字体凝重雄劲，磊落大方，至今仍高悬观音阁檐下，为国内重要墨宝。

独乐寺内有白塔一座，始建于隋代仁寿四年，砖雕塔身，造型如硕大的复钵，引用印度窣波塔形状建成。以后经辽代曾重修过，今天从外貌看三层塔檐由砖垒出，似仍为隋代原塔的形状。

佛教始入幽州约在西晋，当时有嘉福寺建成，至唐称龙泉寺。然而佛教经北朝至隋渐在幽州稳固，至唐盛行发展起来。武德五年（622年），慧聚寺建成，智固和尚在此隐迹，寺址背倚群山，门向幽州城，位居马鞍山高处，辽代时寺内建坛，故俗称戒坛寺。贞观时西山脚下兜率寺建成，即今卧佛寺。

位居房山石经山下的云居寺，建于贞观五年（631年）六月。一天，北面山上瀑水浮来数千株巨木，于是静琬主持建成此寺。云居寺在白带山环峙中，四面还有几座寺庙，如东域寺，中域寺等。这里可称是北方佛教重地，四远遐迩，各方资助，每年来这里的信徒崇信之人“增之如蚁”。唐玄宗的第八妹金仙公主特加崇饰此寺，受到唐朝的格外重视。静琬卒后其弟子继承了他的事业，房山石经的刻造也达到全盛时期。开元九年（721年）释玄英所撰《云居石经山顶石浮图铭》记载惠暹刻经保留在金仙公主塔上，同塔背面有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山顶石浮图后记》，记述开元十八年（730年）金仙公主“为奏圣上（唐玄宗），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因此惠暹、玄英有条件继续刻造几部大部头的佛经，开凿雷音洞下的二个新洞存放石经。

今天云居寺内保留着四个唐代石塔，平面皆为正方形，由汉白玉石磨制垒叠砌成，基坛无座，上段为奇数多层密檐，其中只一座为偶数。各塔咸载明建造年代，最早建的一座为景云二年，晚建的一座为开元十五年。四塔都高约二米余，形状玲珑秀丽，外型简洁朴实，塔壁有佛、菩萨、天王、力士浮雕像，姿态生动，雕工精美，其艺术表现，更强于宗教色彩。云居寺有五台，各台均有塔，位居小西天峰顶间山坳处的金仙公主塔，高约三米多，具有唐代石塔的典型特点，塔身也是用汉白玉石叠制建成，为四方形；下有五阶基座，凿嵌于岩石间，上段为七层密檐，顶端方平；塔身正面有门，门上浮刻半圆形拱门，门侧无窗。塔壁间镌刻铭文，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图后记》，字迹仍可辨认。文内记曰：“范阳县东南五十里，……北限大山分水界，并永充供给山门所用。”足见云居寺刻经及寺内一切费用，都由国家直接命令当地，划出区域为寺产。云居寺是拥有独立的经济力量的。

从各石经的书法艺术来看，除静琬贞观二年的题刻外，多是那些无名艺术家的作品，都与唐初流行的大书法家的字体相近，笔力刚劲，整洁端美，实在可以称为是唐代书法艺术的丰碑宝库。

今房山县磁家务有万佛堂，又称无梁殿或万佛龙泉宝殿，殿内有浮雕石刻《万佛法全图》，为大历五年（770年）雕刻的艺术品。一九五二年在宣武区姚家井，出土薛府君墓志盖及立体石雕生肖龙、蛇、鸡、猪、羊等，雕刻技法，娴熟自然，姿态栩栩如生，表现了高超的艺术造诣。墓室内残存花鸟壁画，是唐代开始兴起的绘画成就。丰台区林家坟唐墓，出土铜牛、嵌金铁马镫、残玉册等，据推测，可能为史思明墓，出土物件均有较高艺术价值。

幽州城内悯忠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建塔于寺内的东南隅；至德二年（757年），史思明又在寺内的西南隅造塔，现存法源寺内石刻《无垢净光宝塔颂》，即指此塔。两塔均已圯毁，而这方石刻，却成为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实证。此方石刻原嵌于寺内悯忠台壁间，现仍存原址展柜中。石刻铭文由张不矜撰，苏灵芝书，高120厘米，广73厘米，共二十二行，文自左起，实为一大特色，书法也堪称为艺术佳作。

幽州蓟县城西北有燃灯佛塔，据考证创建于贞观七年；良乡县城有多宝佛塔，相传建于隋大业年间。可惜此二塔，俱已失去原塔特征。